

现代性的危机:《霍华德庄园》中的家园政治

余小玲

(福建商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在《霍华德庄园》中,资本城市文明破坏了人类的家园,使得主体遭遇分裂的文化和分裂的身份,并开启了寻找现实和精神双重家园的旅程。小说中大量的隐喻和象征再现了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分裂的家园,巴斯特的死亡体现了现代性危机症候在小说文本场域中叙事范式的转变和性别诗学的政治化。福斯特从哲学维度提出的“联结”主题,体现了其家园政治的选择性接纳与排他模式,但是依然无法弥合现代性危机造成的差异。

关键词:霍华德庄园;家园政治;现代性

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5-0073-04

“家园”一词在文学场域中一直是难以隔断的情愫,正如卢卡奇所言,“所有的小说都是患‘恋家症’的。”^{[1](P3)}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不仅书写对家园的深情,而且建构家园,杂糅了多种文化因素和变量的对抗协商,就有了家园政治。“家园政治”是一个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夹杂着地理政治、权力平衡和再现表征。“它涉及身份、地点之间的基本联系和流动、变迁、变化之间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1](P1)}由此可见,家园政治蕴含了主体的身份建构、性别政治、空间政治,以及在诸多变量中的权力分配和动态的平衡,体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关系的问题。个体的存在离不开家园的场域,构建自己想象的家园,在“接纳和排他”^{[1](P20)}中寻回性别、阶级和文化矢量结合的主体性。这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观念,不仅涉及文化、文学,同时也离不开哲性的思辨和反思。

英国小说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海外扩张,家园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嬗变,从丹尼尔·笛福和亨利·菲尔丁笔下殖民扩张的家园开始,发展到简·奥斯汀笔下家庭内部冲突的场所,再到吉卜林笔下的本土和异域的第二空间,最后到康拉德笔下从殖民海外对本土的回望。在小说的文本场中,家园是一种虚构场域的民

族志写作,是一个矛盾共同体,是一个欲望之地,慰藉与恐惧并存,暴力与审美同置,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参与,彰显的是霸权性权力,是一种政治化的行为,同时也是协商的场域。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被称为“文化和社会”的小说,是一部关于英国和人类文明命运的寓言。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指出:“作者们生活在他们的社会历史中,既在不同的程度上塑造那个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经历,又被那个历史和经历所塑造。”^{[2](P57)}作者与历史社会的双向互动,使得文学批评的学术视野扩展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福斯特曾说,《霍华德庄园》是一部寻找家园的小说。^{[3](P29)}家园是处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对抗中的福斯特所关注的主题,他目睹了传统乡村社会逐渐式微和现代都市文明急剧扩张,物质主义迅速膨胀。作为知识分子,福斯特表达了深深的困惑、忧虑和对未来的向往,探讨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和性别等问题,并为解决危机和困境开出了“联结”的药方。

一、隐喻与象征——断裂的家园

现代性自降生以来,不断地给社会带来巨变,“并把越来越多的精神焦虑植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

收稿日期:2017-01-10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社科项目(JAS141126)

作者简介:余小玲(1981—),女,福建宁德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对外宣传翻译研究。

层面……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4](P13)}。福斯特生活的时代,工业化膨胀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导致了社会多层面的裂变和分化,社会已然被编织进一个多元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因此,福斯特在其作品中用忧虑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断裂的家园。

读者阅读《霍华德庄园》时,往往会认为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多有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著名的批评家F.R.李维斯认为,巴斯特的形象是闭门造车的败笔,玛格丽特的婚姻也难以令人信服。^{[5](PV)}福斯特在小说中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素并置,如自耕农与工业文明、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高雅与低俗等,但非此即彼的对立只是矛盾的显性呈现,内里隐含的是福斯特面对不断变化和迁移的世界所表达出来的无所适从和焦虑。可以说,福斯特把个体的生命体验、心理和复杂的情感、欲望、想象都纳入到此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断裂空间,书写了现代性在个体生命和家园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断裂状态。

小说运用了隐喻和转喻来再现家园的断裂状态。男性人物巴斯特在小说中就是通过对高雅艺术的追求来寻求向上的阶梯,同时结识了斯莱格尔姐妹。小说中的隐喻——贝多芬音乐和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拓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高雅艺术是西方启蒙理性在生活中的载体和再现,在文中体现的是英国中产阶级日常的消费,“通过消费,艺术和文学中介再现的自然被意识形态化、城市化和体制化”^{[6](P188)}。自然被城市文本化,艺术被政治化。就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而言,内部充满着变奏的张力,是贝多芬英雄性形象意识和精神的集中体现,具备现代性的文化特征,是典型的对立和不对称的二元结构。西方文化发展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时期,冲破了宗教的牢笼,在人文启蒙时期,举起了思辨和工具理性的大旗,诞生于这一转型时期的交响乐,是当时社会历史境况的文本化叙事,是一种对“理性至上”的崇拜,但是巴斯特不仅没有通过高雅音乐攀附到向上的阶梯。因此,理性并未给巴斯特开出摆脱底层生活状况的良方,反而使其对主体身份更加迷茫。而罗斯金的作品中那些典雅的句子、优美的字词,不断被巴斯特揣摩和模仿,并用于描述自己的生活境遇,这是一个戏仿和解构的过程。在小说中,巴斯特不仅没有通过浸淫于高雅文化获得思想和气质的提升,反而亡命于倒下的书籍,福斯特借用遗落的书籍夺取人物的性命来反讽知识的重负,也就是启蒙现代性的重负,同时批判现代性所承诺的“向上的阶

梯”,反讽了阿诺德提出的教育的功能。作者借用音乐和文学中介作为潜文本,描画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内在轨迹和现代性难以克服自身的分裂性,并表明现代性无法实现自我拯救,因此,自我救赎之路任重而道远。

从空间诗学的角度看,霍华德庄园在象征意义层面体现了福斯特式的乌托邦想象,是“表征的空间”,同时又借用伦敦作为对立叙事来表征乌托邦空间的外部空间。“表征的空间”指在表征空间的过程中,作者的意图、动机,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段。^{[7](P31)}福斯特正是通过借用霍华德庄园描写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写实又具有幻想性的乌托邦空间,完成了对想象家园的建构和对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勾画。小说的开篇展现的是小巧别致的乡村建筑,小说的结尾是秋季丰收时节的庄园,描绘的是宁静美好,但似乎又不可接近,巴斯特的多次庄园欲望之旅,是其回归土地的欲望,因此,庄园被提升到了神话和诗性的高度,具备厚重文化遗产的意象,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完美性的统一;与之对比的是伦敦的都市文化,流动性和偶然性是其特征,现代文明的产物——汽车和房产的数次交易变卖,象征着现代时空框架的初现端倪,时空不再是日升日落,而是不断重组,房子所寓意的家园不复存在,只是商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淡化,空间几乎成为幻象,不断异化。庄园与伦敦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系,虽然现代性导致文明岌岌可危、主体分裂势如破竹,福斯特依然坚守以庄园为象征的土地文明,这体现了他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因此,要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就要实现普遍的和解。

二、死亡与男性——“书写”的家园

雷蒙·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变化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社会情感,”^{[8](P15)}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促使学者和文化战士们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俯视现代性文化场景,并借用逆反的方式来考量男权话语的建构。在文本场中,不断分裂的异质文化空间形成性别话语的张力和矛盾,在叙事的不同层面表达了主体的欲望。“性别话语、叙事、欲望等共同结成小说的图示化结构,使不同性别话语间的对抗、不同欲望主体间的对立乃至欲望主体的欲望之流从小说文本的显性层面沉入隐匿状态,被去政治化或家庭场景化。”^[9]从简·奥斯汀开始,到19世纪,文学叙事中对英国男性的正面特质多有再现,但是到了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死

亡不仅被当作悲剧来看待,更具有深刻的文化表征内涵,体现了文本场中性别诗学在叙事上的转变,主体的欲望和情感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从性别诗学角度来看,小说中男性人物的死亡有着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既是“现代主义作家对现代性和男性权威衰退的恐惧书写”,也是“现代性失败的症候和象征以及审美、结构和历史观照的载体”^{[10](P3)}。男性主体死亡事件体现了英国小说叙事范式的转变,同时寄寓了对男性主体无能的恐惧。

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复制了裘德式的男性人物的死亡,裘德和巴斯特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来自底层阶级,都向往受教育程度比自己高的女性,最后的命运都是突然死亡。唯一的不同是巴斯特在小说中不是主要人物,但是他的死亡却把小说的结局推向高潮。同样,在小说文本内部结构上,也有死亡事件的重复性,如小说开篇不久露丝的死亡和小说结尾巴斯特的死亡,这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位阅读的契机,只有阅读到小说的结尾,对两个死亡事件进行比对,才能读出深层的涵义。从性别书写的角度来看,年轻男性的死亡表征了在现代主义叙事中男权主导地位的危机,同时也预示了重获言说权的尝试。艾柯曾提出哲学以“谁言说”来发问,也许更应该问“谁死亡”,“谁死亡”决定了“谁言说”的问题。^{[11](P65)}露丝是维多利亚时代母亲(女性)的代表,是旧时代文化和精神的代表,“其缺场比在场更加具备影响力”^{[12](P59)}。而巴斯特经历了痛苦的欲望之旅,希望通过高雅文化找到向上攀升的路径,主体在不断寻求中分裂、重构。当巴斯特最终死亡时,喧嚣、困惑和意义都处于缺场位置,同时,具备稳定价值观的世界和家庭得以回归。小说的结尾,露丝的替代者玛格丽特获得了庄园,并且开启了新的生活,言说的权力再次回到了死亡女性的手中。可以说,男性主体性被拒绝、现代文明的长驱直入,使得巴斯特既不能成为绅士,也无法成为商人,只能选择第三条道路——死亡。

从审美的角度看,巴斯特的死亡在小说中呈现出仪式化的文化表演,他的死亡被赋予了审美意义。正如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巴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之旅,犹如悲剧英雄一样,走向既定的命运,且具有揭示和忏悔的意味。当书籍遗落,巴斯特死亡的那一刻,世界如此寂静,没有知觉,但是当他死后,作者在叙事时又复原了众人的知觉,犹如舞台表演一样,死了的巴斯特成为中心,其他人物像演员一样围绕着他,达到了无声的高潮。巴斯特的死亡“表演”体

现了审美与暴力共存,审美激发了暴力,并且成为暴力的奴仆。由此,巴斯特借助死亡实现了从边缘走向中心,完成了仪式化的过程。

在叙事书写上,福斯特依然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福斯特把自耕农巴斯特和海伦的孩子当作英格兰的希望,这渗透着男根中心论。虽然福斯特在显性层面再现了男性主体在现代性危机下的无能和分裂,发出的是女性崛起和掌握主动性的异声,但在隐性层面彰显了其性别政治上的霸权性权力,通过男性死亡事件,把性别诗学政治化和历史化。在“书写”的家园中,福斯特依然倡导的是男性主导论。

三、差异和协商——“联结”的家园

萝丝玛丽·玛瑞格利·乔治女士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立场提出“家园政治”命题。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文明,给传统英国生活方式带来了剧变,这对福斯特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斯特“极端容易受到时间的影响”^{[13](P114)},他是传统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深受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虽然面临一个业已飘逝的旧时代,在作品中再现其精神困惑和迷乱状态,但是,“在他那斑驳的思想底色上,我们发现诸多传统思想与20世纪新思想的异质并存”^{[6](P265)}。他开出了“联结”的药方,借以重构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家园,可以说,这体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哲学思想。哈氏认为,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才能实现话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取消差异的所谓“理想的话语状态”,从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危机。^{[14](P703~738)}

断裂家园中的差异无处不在,现代文明把人抛入一个异质多元的文化混杂语境,使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甚至是个体与自我之间都需要进行对话和协商,才能追寻到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家园。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借助小说文本的力量,表达了其“联结观”的核心——欲望和爱。主体面对日益分裂的文化和身份,内心开启了满足欲望的旅程。“家园与旅行的构想,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文学的、政治化的比喻。”^{[1](P87)}“从一个空间通向另一个空间的旅程,也是一条精神之旅,是一种从断裂过渡到联结的浸礼仪式。”^{[6](P280)}施莱格尔姐妹继承了父亲的精神基因,是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倡导的“美好与光明”的弘扬者。在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追逐的是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家园。维克罕

宅邸虽然是施莱格尔租赁的,但她们在那里生活了20年,那里承载着记忆和父亲的精神气质,当租期临近,房东决定在旧址重建现代公寓时,玛格丽特意识到她与过去的记忆和精神纽带将被隔断,因此内心产生了焦虑和担忧;威尔考克斯家的欧宁住宅具备英格兰乡村的气息,与伦敦的都市生活相映衬,但这只是亨利投资的一种手段,况且玛格丽特也不会通过婚姻的方式来获得对欧宁住宅的拥有权;霍华德庄园是玛格丽特从第一眼就滋生爱意的房子,姐妹俩又找回了过去的回忆,海伦也回到了从前的自己。玛格丽特的寻找家园之旅,渗透着福斯特的土地和根的情结,只有伦敦之外的庄园才能联结英国的过去和现在,是逃避城市文明的精神家园。

“联结不仅意味着个体与他者超越文化差异,而且意味着自我的觉醒——从一个超然的视角重新认识中产阶级群体。”^{[6](P281)}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同阶级和不同文化的异质混合,造成了主体性的身份分裂和文化断裂,但是同样也衍生了希望。小说中,玛格丽特是“联结观”的代言人:“只要联结!那就是她的全部讲道词。只要联结平淡与激情,两者都会被提升;人类之爱将呈现其最高的层次。不要在四分五裂中生活。”^{[5](PIV)}来自书香之家的玛格丽特与来自商人之家的亨利通过婚姻联结,一开始玛格丽特喜欢威尔考克斯一家带来的刺激,但是结婚之后,她越来越发现亨利“生意头脑所固有的缺点”、男性主义的傲慢,但是她还是在几欲破裂的婚姻联结中不断协商,最终达到圆融。在这一过程中,她与妹妹的关系也由心存芥蒂到和解;冷漠、贪婪的亨利把露丝的遗嘱告诉了玛格丽特;而小人物巴斯特通过与海伦孕育的孩子从边缘走向中心。欲望主体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在经历断裂的现实时,都经历了肉体痛苦和精神苦难的考验,要面对情感、阶级、性别的差异和文化断裂的现实。寻找家园的过程也是接受蜕变和再生的过程,交织着不断的对话、协商。可以说,福斯特在异质文化语境中依然肯定了人性,但是这种自由一人文主义的“联结观”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再次证明了“联结观”不能医治现代性危机产生的问题。

四、结语

“……作为纯粹的两极变项的传统和现代性明显的不同并相互对立……在这些条件下,对起源和

神话的关注能左右当代政治忧虑和历史的微尘,传统的观念成了精神避难所。它提供……逃避邪恶势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临时家园。”^{[15](P188)}福斯特用忧虑的笔触在文本中再现现代性的危机,呈现了一个异质文化混杂语境中断裂的家园,以及在此断裂状态分裂的主体和主体的欲望之旅,把想象力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联结起来,构筑了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世界。福斯特的乌托邦构想,作为意识形态策略,只能是一套修正的方案,由于时代和性别的局限性,其提出的“联结观”无力跨越性别、阶级、民族和种族的差异。福斯特在字里行间透露的焦虑、困惑和伦理价值的难以抉择,正是现代性危机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植入。

参考文献:

- [1]费小平.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和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美)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3]Beauman,Nicola.Morgan;a Biography of E.M.Forster[M].London:Hodder & Soughton,1993.
- [4]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7.
- [5](英)福斯特.霍华德庄园[M].苏福忠,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6]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7]张德明.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8]Williams,Raymond.Culture and society[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4.
- [9]黄丽娟,陶家俊.女性的欲望之旅——论《无名的裘德》中女性角色苏认同的多重性[J].外国语文,2009(6).
- [10]Cain,William E.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Theory[C].Routledge:New York and London,2002.
- [11]Lauretis,Teresa de.Technologies of Gender[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 [12]Dever,Carolyn.Death and the Mother from Dickens to Freud: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Anxiety of Origi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 [13](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14]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9.
- [15]Gilroy,Paul.The Black Atlantic[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